



周有光(资料图)

1月13日,111岁(虚岁)生日这天,周有光先生家中比平常热闹些。几位每年这时都从江苏常州老家专程进京的客人,带了精心准备的常州风味寿宴,还有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。周有光很高兴,像小孩一样戴上生日小红帽拍照留念。点蜡烛时,他坚持只点一根,“111岁等于一岁,一事无成!”大家笑开了。

1906年1月13日,周有光出生在常州一个旧式大家庭。妻子张允和为著名“合肥四姐妹”中的二姐,连襟是昆曲名家顾传玠、作家沈从文、汉学家傅汉思。2015年6月,张家最小的妹妹张允和在美国辞世,享年102岁。如今,四个传奇家庭这一辈仅剩周有光一人。

他一生跨越晚清、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和新中国。抗战和“文革”期间颠沛流离近20年,后来又见证了改革开放。青年和中年时期,周有光主要从事经济、金融工作,是复旦大学、上海财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。1955年调至北京,参加并主持拟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,被誉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

85岁时,周有光正式退休。此后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大量阅读文化和历史书籍,研究方向也从“小文化”的语言文字延伸至“大文化”领域的社会发展史和社会文明史。思想之光在百岁之后璀璨绽放,100岁出《百岁新稿》,104岁出《朝闻道集》,105岁出《拾贝集》,108岁出《周有光文集》,110岁时又有《逝年如水——周有光百年口述》问世。著述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,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歧途和误区有深刻反思。世纪老人的暮年之举,被学术界认为是前承“五四”精神、后启1990年以后一度终止的中国思想新启蒙。

“年纪老了,但思想不老。”午餐上,他笑眯眯地说,一口气将生日蜡烛吹灭。

也追《半月传》

刚刚过去的2015年,周有光其过得

日子来了又去,去了又来,一眨眼,一年的日子又悄悄地从手指缝中溜走了。当年终的各种考核、各样总结汇报渐渐接近尾声,我拖着疲惫的身心坐在自家的阳台上,沐浴着冬日少有的温暖阳光,凝望秦巴山区上的山川河流、衰草萧树,过去的一些日子便如蓝天上漂浮的白云浮现眼前。

记得2002年我刚参加工作,被分配在离家遥远的一个乡镇的办事处上班,办事处设在距离镇政府1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。上下两层六间对开的80年代土木结构房子,粉墙黛瓦,一派素净。由于房多人少,我便挑了一间靠后檐的清新小屋住下。

没有电视,没有电话,更没有高楼大厦车水马龙,推开窗是莽莽苍苍的大山,关上窗一切都寂寂静寂,被寂寞充斥。当从繁华的城市一下子跌落到这个偏僻的地方,心里整天充满了苦闷、迷茫和彷徨。

在办事处的工作并不忙,除了偶尔下村搞计划生育、收农业税等季节性的硬性工作以外,安排的其它事情基本上是一周的工作一天干完,大部分时间都晃荡到路上、闲谈和村干部的酒桌上。

一起分配来的几个同事很快与周围的人混熟了,办事处道场边的一间避风的墙脚处,总能见到几个人在读或没读完的书,或者不分昼夜地“垒长城”,而我始终无法融入其中,尽管许多背后地里对我“看不惯”、议论纷纷,但我依旧我行我素,在极度的苦闷彷徨中,寻找自己新的人生目标和出路,强压住心中的烦躁苦恼,走进书籍的馨香世界。

四、五平方米的小屋,除了一床一橱、一桌一椅之外,案头、床头放满了上学时代精心挑选而没有认真阅读的书籍。下村归来,一扇门将我与外界隔绝,全身心浸泡在书籍的海洋里,一盏台灯照耀着寂寞的我和书中的人物对话,启发着我和书中的思想沟通。

渐渐地,在山里的清静、书本的抚慰下,自己狂躁的心灵平静了下来,熨贴在这方清静角落;笼罩在前途的浓雾渐渐散去,露出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。当静下心来重读以前粗略读过的书,犹如细品一杯陈年佳酿,越品越有滋味。厚厚的一本小说从头读到尾,绝对没有什么事打断阅读思路;上学时常常因太忙而要挤时间写日记、练字,在这里完全不必担心时间问题,

怀念逝去的岁月

没有任何繁忙琐事紧逼,心中没有任何杂念,或触景生情、或有感而发、或怀念往事,写写停停,一路悠悠然写下去……就这样,读过的书在桌上本本垒起来,读书笔记也记了一本又一本。

学习累了,抬眼从案头小小的西窗望出去,经常能看到一轮即将西沉的落日徘徊于苍莽的西山之巅,照进屋的夕阳光带来一种透明的宁静和温馨,苍蝇在窗棂上搓脚,微尘在光束里轻舞,都有些倦了。田间小径上疏落地走着荷锄归来的农夫,隐隐听到母牛哞哞地呼唤小牛同归,山色此时已由微红而深紫、而幽蓝,苍然暮色渐渐笼上山脚的树林,西天上独有一缕金红色的云彩冉冉而行。大山中的夜晚空旷清寂的出奇,半夜时分总会有一些鸟儿深情地长啼,在群山之中久久回响,勾起人对往事的阵阵怀想再也不能止息,有时不知不觉读书写作到天亮,当新一轮朝阳照亮山里的山岗,感受山里早晨的清新和美丽,享受山川旷野里的悠然与自得。

不知不觉中,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竟匆匆而去,一年里读了30多本书,记了5大本笔记,书法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,40多篇稿子变成了铅字。之后,一纸调令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,镇党政办的宣传岗位等待着我去工作。临行前的晚上,我靠着已捆好的被子,在漆黑的夜色中静静地坐着,过去经历的往事如电影似的在脑海里一幕幕展现,尽管我明白自己昔日的辛苦努力就为等待这一天的到来,在即将离开这里到新地方的时候,不禁对这间曾经息心静养、曾经磨炼升华、曾经挑灯夜读的小屋充满了无尽的难以割舍的感情,我明白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要想像现在这样读书学习几乎是一种奢望。

当像往日一样升起朝阳爬上东边的山头,将金色的阳光洒在树下花草上的时候,前来拉行李的司机已在楼下按起了催促的喇叭……

几年后,几经曲折崎岖身繁华的县城,眼看周围的人们被名利折磨得浮躁不堪,身处其中的我也未幸免,思想终日在追逐名利与静心读书之间游离徘徊,忍着青春时光日日消耗殆尽,自己却无法抓住,内心备受自责的痛苦煎熬,不禁想起那段在过去艰苦岁月中,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和自己的选择。

□王宝成

周有光:百岁以后新启蒙

艰难而不易。

1月22日,庆祝完周有光虚岁110岁生日不久,儿子周晓平就病逝了。周有光和张允和有着一子一女,抗战期间举家搬迁四川,前后转了17个住处,女儿生病因缺医少药,4岁时不幸夭折。

一直关注全球化

2005年,周有光送了一本新出版的《百岁新稿》给张森根,两人就此结下“书缘”,并成为忘年交。“这本书使我的灵魂深受震撼。”这位今年79岁的拉美问题研究专家回忆,“我从周先生那里得到了重新启蒙的教育。”

当时,他正忙于主持翻译多卷本的《剑桥拉丁美洲史》。随后,毅然把工作进度减缓,全程参与策划编辑周有光百岁之后的著作出版,并为之四处奔走。整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以被深圳读书月评为“2010年度十大好书”的《朝闻道集》为例,前后找了多家出版社才得以问世。由于老人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太超前,他也没有获得某些大师生前那么高的礼遇。出版《周有光文集》时,老人经济捉襟见肘,在常州老家有关部门和一个留学生基金会的帮助下,才得以完成。

在张森根看来,100岁之后,周有光的思想更简洁、清晰,特别是凝聚毕生思考而提出的科学一元论、“双文化论”和对人类历史的“三分法”,还对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文明有重要启发。他特别关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,提出要突破原有的藩篱,“要从世界看中国,从中国看世界”,并为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摇旗呐喊。

从2011年开始,阿拉伯国家就持续动荡,影响至今仍在持续扩散。周有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,重要原因就是全球化时代,伊斯兰教面临新困境。“基督教经过多次宗教改革,就适应现代了。伊斯兰教没有经过宗教改革,所以他还是围着古代的标准,因此今天在世界上,伊斯兰教跟现代化发生矛盾,到全球化这个矛盾越来越大。”

世界上,周有光还尤其关注中国、苏联和美国三个国家的历史。“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,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,掩盖真相。”1945年抗战胜利后,他先后被新华社派驻纽约、伦敦等地工作,并在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。周有光多次告诉叶芳,他最关注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,“是重视社会科学启蒙、发展的结果,才为自然科学发展奠定基础。”在《朝闻道集》、《拾贝集》等书中,多个篇章都在谈对苏联解体的反思。

叶芳还告诉笔者,百岁之后的周有光,

思想更具包容性。“他认为基督教的宽恕精神很值得赞扬,在推动中国进步中,必须要有宽恕的力量,所以要对中国发展有耐心。保持耐心,就会一点点推动社会的进步。”

105岁时,他还告诫晚辈,“中国搞民主很难的,传统里没有民主思想,历史又长,所以要有耐心。中国不可能不走上民主道路。”就像70岁在美国访问做演讲时,有美国人当场质问,你们中国的民主走得慢了,我们美国人看了很着急。他就幽默地回答:“美国只有两百多年历史,所以着急。中国有五千年历史,所以不着急。”

在周有光108岁座谈会上,学者丁东就说,没有出版《朝闻道集》之前,周有光的受众只有2000多名专业人员。自从《朝闻道集》等书出版后,周有光就成了公共知识分子。

公共领域的“知识老人”

多年来,周有光一直住在朝内小街拐棒胡同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,书房仅9平方米,也兼会客厅。张允和生前,书桌前是两椅一几,两位老人每天并坐,红茶咖啡,举杯齐眉。老妻去世后,椅子换成沙发,有时晚上周有光就蜷缩在沙发上入睡。

随着百岁之后著作的相继出版,他也被认为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新启蒙运动中最早的一位领军人物。小小的会客厅变得拥挤起来,何方、资中筠、吴敬琏都是他的座上宾。宾客在沙发和书桌前相对而坐,交流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。

特别是九旬老人何方,对周先生非常仰慕和尊重。2014年两次拜访都是在老伴和张森根的搀扶下,颤颤巍巍地上周有光位于三层的家中,并在见面后对他执弟子之礼。“一个是12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,一个是吃过‘洋面包’的知识分子,我在边上听得如沐春风。”张森根说,那天他们深入讨论了朝鲜战争以及建国初期中苏、中美、苏美之间的战略关系。

去年秋天,渐渐从人生低谷中走出来的周有光,心有所感时还是会给张森根打电话。“以前是他听我们说,现在他精力大不如从前,就是他听我说。”看着如今就像小学生一样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的周有光,张森根心中泛起一阵酸楚。偶尔,他也会插几句有分量的简短评论。赞同对方的看法时,就笑眯眯地翘起大拇指,这也是他很喜欢做的动作。非常高兴

时还会双手鼓掌,用浓浓的常州口音说:“你说得很好!”

周有光的百岁系列著作出版后,引起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的关注。他长期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史,进而特别注意到,在当代中国,除了周有光,还有茅于軾、资中筠、江平、流沙河、袁伟时等一批八九十岁的“知识老人”,他们活跃在公共领域,既有赤子之心,也有学者的良知,关怀现实,针砭时弊。“他们这一代人有良知,能分清善恶;有知识,能分清是非;有勇气,能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真正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而现在的人有更多新知识,但为什么并不见得比这些‘知识老人’有更大的理想?这是令人不得不深思的。”

景凯旋还提出,将来要是书写知识分子史,这些“知识老人”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重要脚印,让中国知识界不至于这么“羞愧”。

在一次和年轻记者交谈时,周有光就曾说,“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是,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;经济从农业到工业化到资讯化;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(专制)到民权统治(民主)。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历史轨道上竞争,中国不是例外。审视中国在这条轨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,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。”

□彭晓玲 人物春秋



图为周有光(右一)与两位连襟:顾传玠(左一)、沈从文

纪念封上的探空火箭



毛泽东主席饶有兴趣地观看T-7M火箭

1960年5月28日,毛泽东主席视察了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——T-7M火箭模型,该火箭于1960年2月19日发射成功。1993年8月21日,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,由北京508所集邮协会发行专题纪念封一枚,留作永久记忆。而我则有幸负责撰写第一枚探空火箭负责人、国际宇航院院士杨南生,于是便近距离地走近了这段尘封的历史,为世人揭开一段邮票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
自古以来,人类就对浩瀚无垠、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充满着无数的幻想,遨游太空,到地球以外的星球探秘,早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的憧憬和追求。在中国就有夸父追日、嫦娥奔月的传说。这些神话与传说,寄托着人类向往宇宙、探索太空的美好愿望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人们渴望自己的智慧和才能,开始把幻想变为现实,跨出了飞向太空的第一步……

1957年10月4日,苏联人成功地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“斯普特尼克”号送上了太空,令世界瞩目。而美国也于1958年1月31日,将一颗名为“探险者一号”的卫星送入太空。中国领导人再也坐不住了。想想看,有着五千年灿烂辉煌文明的中国,其四大发明“指南针、印刷

术、造纸术、火药”曾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巨大贡献。然而,近百年来,中国的国力日渐衰落,科技发展滞后。面对茫茫宇宙,泱泱大国,中国,这条东方巨龙似乎该昂起头来了。党中央十分重视太空技术,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平安与安宁的头等大事。1958年5月17日,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: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。”

要放卫星,火箭先行。为了保密,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全封闭的,办公、设计、住宿和生活全在一座大楼内,有军人荷枪实弹地把守。领导还再三下令:通讯是严格管制的,一切对外的信件、通话内容都不能谈及工作,包括自己的家人。就是这样,还是有一位年轻人因谈恋爱,在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,吹了牛,被安全部门带走了。

毛泽东主席饶有兴趣地观看T-7M火箭

术、造纸术、火药”曾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巨大贡献。然而,近百年来,中国的国力日渐衰落,科技发展滞后。面对茫茫宇宙,泱泱大国,中国,这条东方巨龙似乎该昂起头来了。党中央十分重视太空技术,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平安与安宁的头等大事。1958年5月17日,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: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。”

要放卫星,火箭先行。为了保密,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全封闭的,办公、设计、住宿和生活全在一座大楼内,有军人荷枪实弹地把守。领导还再三下令:通讯是严格管制的,一切对外的信件、通话内容都不能谈及工作,包括自己的家人。就是这样,还是有一位年轻人因谈恋爱,在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,吹了牛,被安全部门带走了。

当时研制人员甚至还不知道“火箭”为何物。杨南生就一边给大家上课,一边指导大家开展研究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有位新来的大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,在黑板上画了个想象中的“火箭”,还豪情满怀地写道“今天画在纸上,明天拿在手上,将来飞在天上!”人们为他的大胆设想而鼓掌。那个曾把心中的火箭画在黑板上的年轻人,也许不曾想到,五十年后的今天,

术、造纸术、火药”曾为推进世界文明进程作出巨大贡献。然而,近百年来,中国的国力日渐衰落,科技发展滞后。面对茫茫宇宙,泱泱大国,中国,这条东方巨龙似乎该昂起头来了。党中央十分重视太空技术,认为这是关乎国防和人民平安与安宁的头等大事。1958年5月17日,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: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。”

要放卫星,火箭先行。为了保密,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全封闭的,办公、设计、住宿和生活全在一座大楼内,有军人荷枪实弹地把守。领导还再三下令:通讯是严格管制的,一切对外的信件、通话内容都不能谈及工作,包括自己的家人。就是这样,还是有一位年轻人因谈恋爱,在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,吹了牛,被安全部门带走了。

□伏萍 钩沉